

近世儒學史的

辨正與鉤沉

彭國翔
著

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 / 彭國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允晨文化，2013.05 面；公分. --（允
晨叢刊；143）

ISBN 978-986-6274-98-5

1. 儒學 2. 文集

121.207

102006654

允晨叢刊 143

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

作 者：彭國翔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印 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3年5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500元

ISBN：978-986-6274-98-5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次

序	余英時	003
前言		011
第一章	楊時《三經義辨》考論	029
第二章	《樗全集》及其作者	053
第三章	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	069
第四章	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 ——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079
第五章	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 ——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139
第六章	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 ——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	199

○

第七章	日本內閣文庫藏善本明刊《中鑒錄》 及其價值和意義	233
第八章	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 相關問題之檢討	251
第九章	周海門與佛教 ——歷史與思想	303
第十章	周海門先生年譜稿	373
第十一章	黃宗羲佚著《理學錄》考論	433
第十二章	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513
第十三章	清康熙朝理學的異軍 ——彭定求的《儒門法語》初探	587

近世儒學史的

的

與

辨正鉤沉

彭國翔
著

序

2000年7月我在台北初次認識國翔，他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即後來修訂出版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北京：三聯書店，2005）。當天聚會匆促，未及詳談，不過他好學的熱忱在我心中卻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四年後他到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工作，曾抽空來訪普林斯頓，我們才有充分的論學機會。以後他多次訪美，每來必和我有數日的交流，由於治學範圍和價值取向都很相近，這種交流為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

國翔的專業是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自正式進入大學課程之日起，便和中國哲學史是分不開的，馮友蘭雖有「照著講」（哲學史）和「接著講」（哲學）之分，但這一分別祇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因為嚴格地說，「照著講」之中已滲進了數不清的「接著講」，而「接著講」也處處離不開「照著講」。所以中國人文學界早就出現了一個共識：研究中國哲學必須雙管齊下，同時進入哲學和史學兩大領域。自胡適以來，哲史雙修便已形成北京大學的哲學傳統，國翔師承有自，並且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在本書〈前言〉中對此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但國翔尊重傳統，卻不為傳統所限，從學思發展的歷程看，他一直在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並嘗試不同的方法和觀點。自《良知學的展開》以來，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種論集問世（包括本書），重點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為他在學問上與時

俱進的情況作見證。

本書題作《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國翔認為在他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前言〉）以他的幾部論集而言，《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偏重於宗教學的進路，《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所處理的是他最擅長的哲學與哲學史方面的問題，而本書則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本史學的作品；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學科雖跨三門，研究宗旨卻一貫而下，同在闡明儒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故相互之間配合得很緊湊。本書所收「辨正」與「鉤沉」十三篇，事實上，都和哲學及哲學史密切相關，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上引「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之說。因為以中國的情形而言，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之間的界線是無法清楚劃分的。據我所見，關於《龍溪會語》和兩部《理學錄》的考論都涉及了明、清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正如先師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有關陳確《大學辨》、潘平格《求仁錄》及章學誠遺書抄本的發現與考訂也為後來清代哲學的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的基礎文獻，其貢獻決不限於「學術史的領域」。

國翔在〈前言〉中特別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訂，他借用傳統的概念，要求哲學和哲學史的工作者「將『宋學』的思想闡發建立在『漢學』的歷史研究之上」。自「五四」整理國故以來，這一要求曾不斷有人提出，似乎早已成人文學界的一個共識。但按之實際，此說竟流為口頭禪，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因此我認為國翔的論點仍值得再強調一次。他在〈合法

性、視域與主體性——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反省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說過下面一段生動而又沉痛的話：

如果不能首先虛心、平心吃透文獻，還沒讀幾頁書就浮想聯翩，結果只能是在缺乏深透與堅實的理解和領會的情況下放縱個人的想像力，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哲學傳統終究難有相契的了解。其研究結果也只能是「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與「過度詮釋」。（收在彭國翔《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80。）

此文撰於2003年，國翔的話當然是有感而發。可知對於文獻基礎的輕忽，一直到最近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時有所見的現象。我完全同情國翔的立場，所以下面舉一個實例來加強他的論點。

很多年前我偶然讀到一篇討論《中庸》「修道之謂教」的文字，作者斷定此處「修」字作「學」字解，乃漢初流行語，並引《淮南子·脩務訓》為證。這句引文說：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著之所脩。

作者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一層又一層的推理，最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結論。其實《脩務訓》此處的「脩」（同「修」）字是「長短」之「長」的意思，高誘在句下注得明明白白：

短、缺；脩、長也。

而且同篇還有另一處「脩短」連用之語：

人性各有所脩短。

此處「脩」字作「長短」之「長」解，更是毫無致疑的餘地。作者即使不信高注，也不應對此內證視若無睹。問題尚不止此，高誘在〈敘目〉中指出：

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

這就將劉安及其門下賓客何以用「脩」代「長」的最深層原因掘發出來了。（這裏我必須補充一句：《淮南子》所諱的是「長短」之「長」，讀作“chang”，而不是「長幼」或「生長」之「長」，讀作“zhang”。）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為什麼竟會誤讀「脩」字呢？這決不是由於他對古典文本的修養不足。恰恰相反，就我所知，無論是「宋學」、「漢學」或哲學，該作者的造詣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依我的推測，他大概是急於證成他的哲學論點，看到〈脩務訓〉中這個「脩」字可資利用，便不再追問此字有無歧義及其在《淮南子》中的複雜背景了。其結果則正如國翔所說，完成了一種「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

我認為這個例子特別值得哲學史研究者的警惕，因為它提供的最大教訓是：

「在哲學起飛之前，研究者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他的歷史文本，其中任何一個字都不能輕易放過！」

這是國翔第一部關於思想史和歷史文獻考釋的專集，我希望他繼續在這個園地中開墾，所以很高興地應他之約，匆匆寫下這篇短序。

余英時

2013 年 3 月 於普林斯頓

目次

序	余英時	003
前言		011
第一章	楊時《三經義辨》考論	029
第二章	《樗全集》及其作者	053
第三章	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	069
第四章	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 ——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079
第五章	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 ——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139
第六章	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 ——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	199

○

第七章	日本內閣文庫藏善本明刊《中鑒錄》 及其價值和意義	233
第八章	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 相關問題之檢討	251
第九章	周海門與佛教 ——歷史與思想	303
第十章	周海門先生年譜稿	373
第十一章	黃宗羲佚著《理學錄》考論	433
第十二章	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513
第十三章	清康熙朝理學的異軍 ——彭定求的《儒門法語》初探	587

前言

本書是我 1997 年迄今十五年間所選十三篇論文的結集。這些文字發表於海內外各種不同的學術出版物，尤以臺灣的學術期刊為多。這十三篇文字都涉及大量中文古典文獻，而臺灣一直使用繁體字這一中文古典文獻的原文，因此，本書選擇首先在臺灣以繁體字出版，就是順理成章的。至於恰好本書所收文字最初多在臺灣發表，或許說明我與臺灣學界有著特別的緣分。

這十三篇文字放在一起，自然不是任意和偶然的。我願意在此略加說明。

我碩士和博士階段是中國哲學專業，但是從大學時代開始，除了哲學之外，歷史和宗教也是我格外感興趣的兩個學科。我多年以來一直認為，人文學術中的不同學科，如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等等，其實都是觀察與思考人文世界的不同角度，彼此之間非但並無高下長短，更需要相互配合，方可掌握人文世界的整全。任何一個學科有所「見」的同時也都有所「蔽」。恰如一個手電筒，在照亮一個局部的同時，不免無視其餘而在周圍留下陰影。因此，這些學科只有彼此配合，各條光束相互彙聚，方能形成「無影燈」，使得人文世界的整體盡可能得到完全的照明。在這個意義上，我很欣賞明儒周海門（1547-1629，名汝登，字繼元，號海門，浙江嵊縣人）所謂的「教本相通不相違，語可相濟難相非」這句話。現代學術早已如莊子所謂「道術為天下裂」，分工日益細密。在沒有專業和擅長的情況下以「通人」自居，妄談打破學科界限，只

能流於掩蓋浮泛與空疏的遮羞布。但學者的學術訓練不限於一門學科，掌握一門以上的研究方法，恰如武學高手可以精通一門以上的武藝，雖然能「至」與否有賴於個人主客觀的諸多條件，但卻應當是「心嚮往之」的目標。當然，兼通一門以上的武藝，是必須以先通一門武藝為前提的。同時，兼通一門以上的武藝，也並不意味著不同的武藝由於可以集於習武者一身而泯滅了各自練法的不同。恰如武學高手可以兼擅內家的太極拳與外家的譚腿，但太極和譚腿各自的習練法門卻不會因此而混同一樣。在哲學的專業之外，我對於史學和宗教學的嘗試，正是在這樣一種自覺之下進行的。

任何一種學術自覺的形成，無疑與學者的閱讀經驗或者說所受師長的影響有關。其實，所謂學術訓練，除了師長的耳提面命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讀書。經常閱讀某種學科的論著，就意味著經常在接受某種學科的學術訓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的傳統，從馮友蘭、張岱年到陳來先生，都非常注重將哲學思想的「辯名析理」，建立在堅實的對於歷史文獻的「考鏡源流」這一基礎之上。借用傳統的語言，就是將「宋學」的思想闡發建立在「漢學」的歷史研究之上。我在北大哲學系六年研究生的階段師從陳來先生，雖不敢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卻也很自然且自覺地接受了這一學術傳統的影響。事實上，在就學北大之前，我已經對此具備了一定程度的自覺。因為在大學四年泛觀博覽的過程中，除了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之外，從錢穆到余英時先生這一學術譜系，同樣已經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研究生的階段，我就很明確地具有了這樣一種自覺。2000 年得遇余英時先生以來，經常得到他

的教誨，這種自覺，更為明確。記得當初有一次在陳來先生的研討班上，我就借用當時官方流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這一語言，用「漢學和宋學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話，表達過自己的這種自覺。當然，對我來說，除了「漢學」和「宋學」這「兩手」都要抓、都要硬之外，還有一個「兩手」，那就是「中學」和「西學」。在我看來，自現代學術建立以來，尤其民國時期所建立的良好學術傳統，正是要「融匯中西」。這也是現代中國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關於這一自覺，我曾在有關反省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的文字中有所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我的《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一書第二部分的相關文字。

我之所以要首先交代自己對於學術研究的這樣一種自覺，恰恰因為本書所收的十三篇論文，都是在我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至於我之前出版的《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則是涉足宗教學尤其是比較宗教學的開始。

其實，在我最近出版的《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從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序言中，已經預告了本書的出版。如題目所示，如果說「詮釋與思辨」表明了「哲學」的維度，那麼，「辨正與鉤沉」則意在提示「歷史」的面相。我至今仍不敢說已經略通「史學」這一「藝」，但本書文字大都經歷了嚴格的學術審查制度而在海內外專業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或許可以說，至少從學術思想史和歷史文獻學的標準衡量，作為我「學而時習之」的歷練，本書可以視為我一直「兼修」史學的一個結果。